

故宫博物院定窑学术研讨会综述

项坤鹏

2012年9月18日至19日，由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主办的“定窑学术研讨会”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敬胜斋举行，共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美国、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8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27位代表宣讲了论文，主要围绕定窑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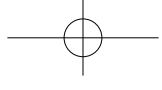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一 “官”、“新官”款白瓷研究

唐宋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划有“官”、“新官”字款，这种情况早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不断有带“官”、“新官”字款的白瓷和青瓷器出土，其中以白瓷居多。据统计，“官”、“新官”款白瓷在我国陕西、河南、河北、辽宁、北京、山东、内蒙古、四川、湖南、浙江、江苏、广东及埃及、韩国等地均有出土，器形有瓶、壶、罐、洗、碗、盘、碟、把杯、盏托、盒、枕等。关于“官”、“新官”字款白瓷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产地；二是最早年代；三是“官”、“新官”款的涵义。

1. “官”、“新官”款白瓷的产地

1955年在内蒙古赤峰大营子村发现一座辽墓，出土有“故驸马赠卫国公”铭墓志并器物千余件，其中包括四件“官”款白瓷。1956年该墓部分出土物在故宫博物院保和殿“五省出土文物展”中展出。关于其中的“官”款白瓷，金毓黻先生曾著文，指出凡有“官”字的白瓷，都是辽官窑产品（金毓黻：《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对此，陈万里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官”字款白瓷以往在河北、河南两省均出土过，产地非定窑莫属（陈万里：《我对于辽墓出土几件瓷器的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此番讨论引发了学术界对“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争论。随着“官”、“新官”款白瓷在墓葬、窖藏、窑址中的不断出现，学者们提出的观点也越来越多，总结起来，有定窑、邢窑、缸瓦窑、龙泉务窑、井陉窑、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窑甚至是湖南窑口、浙江窑口、安徽繁昌窑等多种说法。

关于如何解决“官”、“新官”款白瓷的产地问题，故宫博物院的吕成龙先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孟繁峰先生以及河北省文物出境鉴定中心的穆青先生在此次研讨会上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吕成龙在题为《定窑瓷器研究综述》的发言中指出，在利用类型学方法判断其产地时，一定要综合观察其风格特征，而不能以点带面。通过认真比对，他确认这类瓷器基本上都是定窑产品，可能有极少数邢窑产品，不可能是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瓷窑以及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内蒙古缸瓦窑及辽宁省辽阳



市江官屯窑的产品。孟繁峰在题为《井陉窑“官”字款、窑冶官及相关问题》的发言中介绍了在井陉窑发现的“官”款白瓷片，在结合对相关墓志、石幢拓片的分析中，结论认为唐五代时期井陉窑确曾由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镇设官管理，在该地发现的“官”款白瓷片就是井陉窑的产品，即井陉窑是“官”款白瓷的产地之一。穆青则介绍了其正在进行的尝试，即以墓葬出土器物 and 窑址出土标本为基准，利用笔迹鉴定学对“官”、“新官”款白瓷进行年代和产地判断。

由此看来，关于“官”、“新官”款白瓷的产地，认为定窑是其产地之一的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接受。2003年，在内丘西关邢窑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十余件“官”字款白瓷标本，且有一件刻“官”字款的碗与匣钵粘连在一起，因此邢窑也被认为是可能的产地之一。另外，在井陉窑发现的“官”款白瓷片，为解决此类瓷器的产地问题提供了新资料，但是要确定这几块瓷片是井陉窑的产品而非外来的其他窑产品，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对此，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将来相关部门对井陉窑的进一步发掘。至于其他窑口生产“官”、“新官”款白瓷的说法，目前似乎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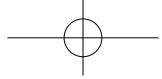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2.最早年代

除了产地之外，关于“官”、“新官”款白瓷出现的最早时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权奎山先生曾指出(权奎山：《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1999年)，“官”款白瓷年代最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为代表。此后，穆青又提出(穆青：《定窑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在灵寿县晚唐墓出土了两件白釉“官”字款钵，同墓出土的一块长方形灰砖上，有墨书“口福二年岁次癸丑十月乙未朔廿”等字样(唐代景福二年是癸丑年，897)。这是目前纪年墓葬出土“官”字款白瓷中时代最早的，比浙江临安钱宽墓出土的“官”字款白瓷早七年。穆青在本次研讨会的发言中又提到了这一点，并向与会者展示了相关图片。临安市文物馆的朱晓东先生在题为《钱宽、水邱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及相关问题探讨》的发言中提出，钱宽、水邱氏墓所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极有可能是定窑的产品，其来源是中原王朝对吴越王钱镠的赏赐，据《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载，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77)授镇海军副使，此后不断有任命，到龙德三年(923)被封为吴越王，所以朱晓东认为，钱氏家族拥有这批瓷器的年代上限为唐乾符四年至唐天复元年(901)，而其烧制年代也大致在此范围内。

也就是说，就目前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而言，“官”款白瓷的最早出现年代可定在晚唐时期无疑，而灵寿县晚唐景福二年墓中“官”款白瓷的发现，可将这个时间提至897年以前，至于是否还能更早，尚不得而知。

3. “官”和“新官”字款的涵义

关于“官”和“新官”字款涵义，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热点。就“新官”款而言，一般认为“新官”是相对于“官”而言，即“官”在前，“新官”在后。至于“官”字款，目前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一，指官窑；二，是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的简称；三，“官”、“新官”是“官样”、“新官



样”的省写，均为收取实物税的标准实物样；四，是指地方官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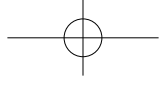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关于这点，本次研讨会上也有学者论及。吕成龙在对定窑瓷器上所刻划的各种铭文进行了汇总比较后指出，在各种铭文中，以“官”字款最多，他认为，所谓“官”、“新官”款是一种标志，署有这类款的瓷器，应是官方认可的供官方征用瓷器所应达到的最起码的质量标准。但是孟繁峰提出了不同见解，他指出，中唐至五代时期，河北地区藩镇割据，军阀或节度使独霸一方，《井陉历史文化·文物卷》所录唐代石幢拓片“天长镇遏使兼知冶窑务事”中之“天长镇遏使”，不仅是天长军的最高军政官员，同时还兼领冶务和驿务，其下设“知冶侍御”、“冶判”、“炉前押官”等掌管瓷窑冶的官员，在这一历史时期，井陉窑有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镇的窑口，其窑官隶属于成德军，所以井陉窑“官”字款瓷器应直接上交至成德军藩库，供成德节度使各种所需。同样，邢窑及南邻的临水窑时属昭义军辖区，当为昭义军窑场；定窑时属义武军辖区，当为义武军窑场，义武军辖易、定两州，其长官又被称作易定节度使，故定瓷中的“易定”刻款涵义即为易定节度使的专用之器。

国内外众多地区都发现了“官”、“新官”款白瓷，其出现年代涉及晚唐至北宋这一较长的历史阶段，产地涉及邢窑、定窑以及其他窑口，所以要解开“官”、“新官”字款的内涵和烧造这种瓷器窑场的性质，恐怕不能将眼光只局限于一地一时，而是要联系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等范畴的种种因素，以及金属器、漆器、砖瓦等其他门类文书上所署的同类标志进行综合考虑。

二 定窑与其他窑口的关系

定窑始烧于唐代，以烧白瓷而驰名，还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等，其中白釉装饰主要由刻花、划花和印花三种，至于装烧方法，定窑在北宋中期首创的覆烧法对北方及江南地区青白瓷窑有很大影响。在定窑从初创到发展成熟再到衰落的过程中，与许多窑口关系密切。比如邢窑，定窑烧造白瓷的年代要晚于邢窑，晚唐至五代时期，随着定窑的兴起及邢窑的衰落，出现了“定盛而邢衰”的局面，一般认为，定窑在生产过程中采纳了邢窑的制作工艺，李辉柄先生(李辉柄：《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认为，定窑烧制器物的特征大体与邢窑相同，由于两窑在地理位置上相处很近，所以相互学习相互竞争。除了邢窑外，定窑与磁州窑的联系也十分引人注目，秦大树先生(秦大树：《论磁州窑与定窑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指出，北宋前期二者的联系表现为定窑对磁州窑的单向影响，北宋后期到金代，两窑的工艺互相影响，入元以后则是磁州窑对定窑的单向影响。

除此之外，定窑与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地的窑口均有所关联。在此次研讨会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新民先生在题为《河南出土的定窑与定窑类型瓷器概述》的发言中，介绍了河南地区生产的定窑类型的瓷器，如河南修武县当阳峪窑，该窑除了生产绞胎瓷和剔刻花瓷外，还生产制作精工的白釉、黑釉以及酱釉瓷，其产品质量可以和定窑同类器相媲美。又如鹤壁市鹤壁集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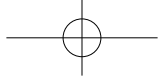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所生产的细白瓷和粗白瓷以及黑釉瓷，都极具定窑风格。陕西省考古研究员的王小蒙女士在题为《邢窑、定窑制瓷工艺对唐五代耀州窑的影响》的发言中提到，邢、定窑的白胎以及薄胎瓷工艺对唐末五代时期的耀州窑影响很大，五代耀州窑所生产的高档青瓷，正是在吸收越窑青瓷工艺的基础上，接受了来自邢、定窑的白胎和薄胎工艺的新因素发展创新而成的。定窑的影响力不仅涉及周边的窑口，距离较远的窑口同样也受其影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彭善国先生在题为《辽代的白瓷》的发言中谈及，定窑对辽地白瓷也产生了影响，他提出产生影响的两种渠道，一是工匠的流动，二是产品的北播。成都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黄晓枫女士在题为《四川盆地的白瓷生产——略谈磁峰窑白瓷生产与定窑的关系》的发言中指出，南北朝至隋代，成都平原的青瓷窑场中出现了零星的白瓷生产，尤以邛窑固驿窑最为突出，其产品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北方窑业工艺特征。唐代至北宋初年，白瓷生产不见于四川盆地，随着宋代早中期瓷业经济在四川盆地的蓬勃发展，各地窑场纷纷开始生产白瓷，磁峰窑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深受定窑影响的白瓷窑场。除此之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叶喆民先生在题为《定窑重议》的发言中也着重论及了这一问题，将定窑与其他窑口，如邢窑、巩县窑、磁州窑、建窑所生产的产品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中国古陶瓷生产发展到唐代已初具规模，宋代似乎渐入佳境，瓷窑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生产技术互相借鉴，产品流通范围颇为广泛，学者们因此也提出了“窑系”的概念。正如上文所论，定窑与诸多窑口存在着联系，彼此之间的影响或单向或双向，产品既有相似又有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断定瓷器的窑口增加了难度，要处理好这一问题，叶喆民先生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要重视科学发掘工作，既要横向比较，又要纵向比较。另外，关于瓷器生产技术的传播与影响，深入探讨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历史因素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 定窑的发现、调查与发掘

从20世纪30年代叶麟趾先生发现定窑遗址至今，定窑经历了多次的调查与发掘，现整理如下：20世纪30年代，叶麟趾先生在河北省曲阳县发现定窑遗址，1934年，叶先生在所撰《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做了详细记述；1941年，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前往定窑遗址进行调查；1951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杨忠礼先生调查了曲阳县的东西燕川村和涧磁村窑址，并采集了部分标本；1957年，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王莉英、葛季芳等诸位先生前往定窑遗址调查，采集瓷片标本近两千片；1960至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1977年、1982年和1991年，故宫博物院先后派人前往定窑进行调查、采集瓷器标本；1985至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北镇村、涧磁岭、野北村、燕川村等地进行了考古发掘；2009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在涧磁岭、北镇、涧磁西以及燕川四个地点进行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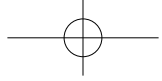
以上提及的关于定窑遗址发现、调查与发掘的问题，吕成龙先生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高美京女士在发言中都做了阐述，此外，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黄信先生在题为《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考古发掘》的发言中，详细介绍了2009至2010年定窑遗址考古发掘的成果，主要包括重要遗迹和典型器物等。定窑的调查和发掘对定窑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除了要追寻文献所提供的线索外，还要依靠考古资料来加以印证，2009至2010年的定窑遗址发掘，是继20世纪80年代定窑发掘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对于全面了解定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面貌和烧造工艺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四 定窑的分期及相关研究

关于定窑的分期，此前早有学者涉及。在叶麟趾先生发现定窑遗址后，对定窑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对定窑的分期及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关于对定窑分期的不同观点，孟繁峰曾经做过统计（孟繁峰：《河北瓷窑考古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年）。

在此次研讨会上，高美京在题为《论五代定窑》的发言中，对孟繁峰的统计进行了补充，加入了2000年以后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她截取五代这一特定时段，对五代时期定窑瓷器的主要品种、装饰技法、装烧工艺等方面进行全面探讨。她指出，五代时期的定窑与唐代相较，窑业规模迅速扩大，产品质量更高，种类更多，在瓷器品种和制瓷工艺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创新和发展，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并出现了海外贸易。与高美京的研究方法类似，深圳市博物馆的喻珊女士选取宋金为特点时间段，在题为《略论宋金定瓷的流布》发言中，她结合前人的分期成果，将窑址外所出的宋金时期定瓷分为北宋前期、北宋后期、金/南宋前期、金/南宋后期四个阶段，并指出在这四个阶段中定窑瓷器的出土数量分别为增加、减少、大大减少和大大增加，而定瓷的流布范围也基本与出土数量相对应，经历了扩张、收缩和再扩张几个阶段，出土数量较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窑址周边、南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及南方的水路交通枢纽，窑址周边的平民所使用的多为定窑粗瓷，等级较高的墓葬中所使用的定瓷质量一般较高。历史上，定窑瓷器除了在国内大范围使用外，还通过海外贸易输出到世界各地。以韩国为例，在许多遗址中都出土了定窑瓷器。韩国国立济州博物馆的金英美女士在题为《高丽遗址出土定窑瓷的分期》发言中，介绍了高丽遗址中定窑瓷出土的情况，并对这些遗址中出土的定窑瓷器进行了分期，共分成了五代晚期至北宋早期、北宋早晚期至金早期、金中晚期三期，其中第一期的定瓷数量较少，以“官”款白瓷碗等奢侈品为主；第二期的定瓷数量大增，以优质的白瓷、黑釉瓷等为主，刻划花技法运用较多；第三期则以印花制作的纹样丰富的碗和盘为主。总体来说，高丽遗址中发现的定瓷质量较高，是通过政治外交渠道和商业渠道流入高丽的。

目前来看，关于定窑瓷器的分期尚存在多种意见，但笼统地说，晚唐五代为定窑的发展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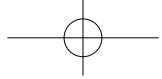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北宋和金代为其繁荣时期，自元代开始，定窑开始进入衰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定窑的始烧和停烧年代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关于始烧年代，目前学术界有晚唐、唐代早期和中晚唐（早不过中唐）等几种观点；而关于停烧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元代，至于具体到元代哪一阶段还没有定论。耿宝昌先生在题为《漫谈定窑》的发言中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他向大家展示了一件定窑绿釉三足方口鼎，鼎上有铭文“至元二十二年造”，元代有两个至元，铭文上的“至元”究竟属于“前至元”还是“后至元”尚不得而知，但该鼎及其铭文为我们探讨定窑的烧造下限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 关于金属釦瓷器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釦”，就是在陶瓷器上（多于口沿处）用金、银、铜、锡等金属镶边的工艺，其实这种工艺不仅见于陶瓷，1957年西安市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中就曾出土过金釦白玉杯。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瓷器上最早出现“釦”的年代为唐代，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有两件漆平脱银釦秘色瓷碗，口沿和底足均镶以银边，同出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载：“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除包括秘色瓷在内的青瓷外，在白瓷、影青瓷、黑釉瓷中均可见到镶金属边的现象，关于此，伍秋鹏先生曾做过详细统计（伍秋鹏：《试论瓷器口沿镶金银问题》，《东方博物》2006年第4期）。

曾有人提出，瓷器镶边可能与覆烧工艺相联系。自北宋定窑首创覆烧法开始，这一装烧技术影响了许多窑口，用这种方法烧造出来的瓷器均带有“芒口”，即口沿一周无釉露胎，而在芒口瓷器上确实多见镶金属边的情况，但是这种装饰方式的出现并非因为覆烧。正如上文所述，在覆烧工艺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镶金属边的器物，且有若干并非芒口的器物上也镶有金属边，水邱氏墓中有14件器物上有鎏金银釦但都非芒口，而芒口的瓷器上也并非全部镶边，如1969年河北省定县静志寺和净众院两座宋代塔基地宫中共出土了150多件定窑瓷器，其中近10件有芒口却没有包镶金属边。在此次研讨会上，也有学者就瓷器上包镶金属边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朱晓东着重探讨了钱宽、水邱氏墓中出土白瓷器上的鎏金银釦的形成原因，他认为这批瓷器很可能是中原皇朝的赏赐之物，钱氏家族在其上镶以金银边以示殊荣，此外加装金银边是吴越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皇室的秘色瓷器上所镶银边即是这项工艺的体现，此后钱氏王族进一步发展，将瓷器加装金银边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自用器物上也装以金银边。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小林仁先生在题为《定窑覆轮考》的发言中介绍了唐至明清时期镶金属边瓷器的情况，他同时指出，瓷器上镶金属边，就用途而言，一是为了增加装饰效果和附加价值，二是为了增强其实用性，隐藏芒口，保护瓷器的口沿等部位，镶金属边瓷器的加工者多为进贡者、宫廷作坊和欣赏者，所用的材料多为金、银、铜、锡等。此外，小林仁还对制作过程中所使用的粘料提出了疑问，耿宝昌先生回应了这一问题，他说，就清代和民国而言，在瓷器上用来镶金属边的粘料是一种叫做“孩儿茶”的



中药，这种材料既有粘性对人体亦无伤害。

由此看来，镶金属边的作法早已有之，其年代可以追溯到隋唐甚至更早，下可延伸至明清，其主体不仅限于陶瓷，也见于玉器等，一般镶金属边主体的质量都较高，而镶边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提高或延续其使用价值，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需要说明的是，在瓷器上镶以金属的做法不仅见于中国，也见于国外，古代欧洲就经常有将中国瓷器镶上金属配件进行装饰甚至改变器形的例子，较早的是一件现藏于爱尔兰国家博物馆的执壶，其原型是一件玉壶春瓶，年代大约为14世纪，流入西方后被加装了银质的流、柄、托和盖而改造成了执壶，16世纪以后，这种做法就更为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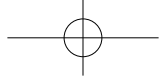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六 其他方面

除了以上问题，会议涉及的其他问题还有定窑瓷器赏析、定窑瓷器胎釉科学检测、定窑瓷器与宫廷的关系、南宋定窑瓷器南传的方式等。

定窑作为五大名窑之一，生产出了若干精品瓷器，在此次研讨会上，不少代表就定窑瓷器进行赏析。故宫博物院的叶佩兰女士在《北宋定窑白釉牡丹纹龙首大净瓶赏析》的发言中，从河北净众院出土的龙首刻划牡丹纹大瓶谈起，探讨了定窑的瓷塑艺术和胎釉工艺。鸿禧美术馆的舒佩琪女士在《鸿禧美术馆藏定窑瓷器》的发言中，介绍了鸿禧美术馆所收藏的定窑瓷器及标本。国家博物馆的胡朝辉女士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金代瓷器研究暨相关问题探讨》发言中，着重介绍了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代表性的宋金定窑瓷器。天民楼的葛师科先生在《定窑浅谈——从天民楼收藏的几件定窑瓷器谈起》发言中，介绍了天民楼收藏的一些定窑瓷器。

科学检测在瓷器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尤其对于瓷器的胎釉等方面的分析，运用科学检测的方法，往往可以得到更为客观和具体的结论。故宫博物院的康葆强先生在题为《对定窑白瓷原料的几点认识》的发言中，介绍了其使用元素分析、物相分析、热分析、扫面电子显微镜方法对2009年定窑遗址出土的相关制瓷原料及唐、五代、北宋、金代和现代仿定瓷的胎釉进行分析的结果，他指出，通过白瓷胎体成分可以较好地地区分唐、五代、北宋和金代的样品，北宋晚期地层出土匣钵中的灰料中提取出的木炭结构与柏木相符，这为研究釉料组成提供了线索，他指出，定窑瓷器在配置釉料时并没有加入白云石。无独有偶，北京大学的崔剑锋先生在《定窑细白瓷(晚唐五代——金代)胎釉化学组成时代演进的研究》发言中，介绍了其使用ICP-AES对定窑2009年涧磁—北镇区发掘出土的168件不同时代样品胎、釉的主量、微量元素化学测试的结果，结果显示：定窑胎、釉配方随着时代呈现规律性的变化，通过化学分析，可对细白瓷的大致时代进行判断，而且通过成分分析可以大致推断其胎、釉的可能配方。

另外，日本爱知县陶瓷资料馆的森达也先生在题为《关于定窑白瓷的仿铜礼器制作——从与汝



窑、南宋官窑的比较谈起》发言中，对定窑白瓷、汝窑青瓷以及南宋官窑青瓷的仿青铜礼器制作进行了分析比较。他认为，相较于后两者，定窑瓷器模仿汉代及商周青铜礼器的产品数量较少，而这些窑口的瓷器产品模仿汉代及商周青铜礼器的做法反映了朝廷与皇帝的嗜好，由此表明，定窑瓷器与宫廷的关系没有后两者密切，能够直接领受皇室与宫廷的指示，制作迎合皇帝喜好的产品，而是供给宫廷上等实用瓷器的贡窑。台北的蔡玫芬女士在题为《南宋的定窑瓷器》的发言中，聚焦于南宋的定窑瓷器，关于杭州都城的宫殿、居住遗址遗迹以及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等地纪年墓、窖藏中定窑瓷器的来源，她认为是通过贸易与订烧的方式来自北方定窑，而非北宋的遗留或是南方相关窑址的产物，南方的订烧正是宋金战后定窑复苏的重要因素之一，盱眙是当时南北方定瓷流通的中心。

最后，耿宝昌先生和叶喆民先生在闭幕式上进行了总结，他们肯定了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举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活动，既回顾了定窑发现与研究的历史，又展示了当代学者的研究水平、规划了今后研究工作的方向，达到了预期效果。正如两位先生所言，此次研讨会的举办为定窑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与会代表们结合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考古学、历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角度进行了深入讨论，尽管对某些问题还存在不同看法，但总体上取得了较大共识。总之，此次研讨会讨论热烈，学术气氛浓厚，把定窑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科研处]

(责任编辑：张 露)